

解放战争时期江西游击区 的开辟与发展

吴松郎

一九四九年一至五月，金萧工委、金萧支队在建德、桐庐、分水、淳安四县边区，开辟了以建德罗村为中心的江西游击区，建立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游击队，并逐步在地方建立起党政组织，为配合金地萧区的人民武装斗争，迎接大军南下，最后接管建德、桐庐两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江西游击区的开辟

一九四九年一月，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取得了肇峰山、戴村、凤岗、陈蔡等战斗的胜利，壮大了根据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不少敌人营垒里的要员不断向我投诚，出现了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势。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大好形势，一月中旬，中共金萧工委在诸暨马剑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金萧工委书记、金萧支队政委张凡和支队长蒋明达作工作报告，总结了四次外线活动经验，提出了“大刀阔斧，放手发展，雷厉风行，加速工作”的口号，决定继续开展第五次外线出击，开辟江西游击

区。所谓“江西”是指富春江以西、徽江以北、分水以南、直至淳安东部之桐庐、建德、分水、淳安四县边区。

为了完成打通浙皖通道，开辟江西游击区这一任务，张凡奉命率支队主力二大队和支队部直属单位共一百人，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从根据地出发，横渡富春江，通过桐庐、建德、分水、淳安四县结合部，行军十三天，到达皖南与皖浙纵队会合。二月十二日挥师回根据地。此行五战五捷，取得了第五次外线活动的重大胜利。

一月二十日，西征部队到达淳安清平源，沿途袭击了建、桐边界的敌芝厦警察所和刚进驻安仁的敌王之辉部；捣毁国民党钟山乡公所和大洲乡公所，并打开粮仓，救济贫民；张贴宣传标语，为开辟江西根据地创造了先决条件。当天，张凡在聚壁章坑主持召开会议，宣布由丁有进、陈风江、胡天、沈新友、袁惠子、汤永禄、张友源、周关良等十一人组成“江西武工队”，陈风江任指导员，沈新友任班长，留在建、淳、桐、分四县边区开辟江西根据地。

二、江西游击区的建立和发展

江西武工队开始以桐岭、和尚尖、黄坡塔为落脚点，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以后逐步扩大活动范围。武工队一方面动员青年参军，一方面从国民党军政土顽处搜缴枪支，武装自己。到二月下旬，武工队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在黄坡塔整编为三个班，其中一个为短枪组。

江西游击区革命力量的发展，为在这里建立党、政、军组

织，领导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

1、建立江西工作委员会

三月一日，中共金萧工委下达了关于成立党的江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由王涌浩（王伯达）、陈风江、丁有进为委员，王任书记。接着江西工委积极准备成立第五大队。三月三日，分水起义成功后，张凡率部回师，命王伯达、丁有进带领一个武装班和吴长春等一批骨干来江西游击区，于四日到达罗村。当晚在罗宗敬家召开第一次江西工委会。会上宣读了金萧工委关于成立中共江西工委的决定，着重研究了成立第五大队及五大队干部人选问题。决定王伯达负责全面，丁有进分管政府工作，陈风江分管武装和组织工作。

2、建立金萧支队第五大队

根据江西工委的决定，三月五日在罗村召开全体游击队员大会，王伯达宣布第五大队正式成立，同时宣布吴长春为大队长、王伯达为教导员等领导名单。五大队开始编制一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中队长宓光元，指导员陈风江；分队长李维新，分队副方树忠。不久在歌舞村组建了突击中队，由韦启明任中队长。各队经过一系列对敌顽斗争，队伍不断壮大，人枪成倍增加。四月十日，五大队主力一百六十多人集中罗村，正式扩编为三个中队。一中队由宓光元为中队长，陈风江为指导员；二中队以原独立分队为基础扩编，由李维新为中队长，沈新友为副中队长，季沉为副指导员；三中队以原突击中队为基础，由韦启明为中队长，夏德富为副中队长，鲁巴炎为指导员。

3、建立江西县政府

建立地方民主政权，是江西游击区的一项重要任务。三

月十四日浙东行政公署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陈一文（挂名、已北撤）为江西县县长，丁有进为副县长。三月十五日，江西县政府在罗村举行成立大会，丁有进作了县府成立经过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还决定由陆千权、孟华负责宣教工作，胡天负责财粮工作，张友源、徐正寿分别任武工队正、副队长。四月上旬，江西县先后成立了建分、淳建、建桐、桐分四个区，各区建制如下：建分区区长罗宗敬，特派员姚滁，武工队长毕志远；淳建区区长邵克明，副区长许瑞春，特派员金世耕（鲁行），中队长邵克明（兼）；建桐区区长吴博泉，特派员陈静之，中队长周韬；桐分区区长蒋文浚，特派员陆千权，中队长姚锡清。

三、江西游击区的一些重要活动

1、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游击队，壮大革命力量：江西游击区干部、战士每到一地都注意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参加游击队。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提高了群众翻身求解放的觉悟，参军参战成为这一带的社会风尚。游击队伍不断扩大，至解放，江西县游击区已建立了一支有三百多人的人民武装队伍。

2、搜缴敌人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在开辟江西游击区前期的一九四八年除夕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旬，武工队先后袭击了分水县百江、歌舞警察所，缴获枪支二十支；捣毁淳安清平乡公所、建德莲花乡公所，缴获枪支十二支；突击中队在

韦启明率领下曾袭击于潜长前乡公所，缴获三十余支枪和若干弹药。这样，不但扩大了人民武装，而且使国民党地方政权陷于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游击区军民还先后粉碎了王之辉部、丁谷部、国民党七十四军、驻淳安“四区”独立营和国民党建、淳、桐、分四县伪自卫队的多次围剿追击，使游击队声威大振。

3、开仓济贫、收缴浮财，保证部队供给：游击队每到一地，首先打开国民党官赋粮仓，救济贫民。江西地区内有建德的溪西、谢田、牌楼、外章、大洲；分水的百江、下塘；淳安的湖下；桐庐的钟山等几十个官赋粮库和地主粮仓全被打开，使当地群众领到一千多担粮食，这一举动深得民心，极大提高了群众拥护游击队、参加游击队的积极性。另外，还向这一地区的地主豪富送发派粮征款通知书，收缴殷富捐，征收大米、球鞋和布匹。这些征收来的钱财和粮食，保证了江西县政府和五大队低标准的军需供给，並按规定送交支队部，支援了全局的供给需要。

4、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扩大革命阵营：江西游击区工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有关统战政策，对于向我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不计前嫌，有的经过审查考验后，还吸收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以壮大革命阵营。如曾是王之辉部的区队长吴长春、班长宓光元和为国民党干事的军政人员罗宗敬、韦启明、毕志远、宋浚文、吴博泉等人，都先后接受他们加入革命阵营，有的还安排担任了游击队的领导职务。江西游击区还重视对当地士绅、地主、土豪的教育、改造和利用。如太平乡练村保长×××和妻子饶

莲女为我做了一些好事，他家里成了我建淳区的秘密联络站，向我提供了不少情报。

江西游击区的这些重要活动不但巩固、发展了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而且为大军南下，最后顺利接管建德、桐庐县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萧支队接管建德前后

李新富 周鲁生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2军35师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浙西山区，进驻建德梅城。

金萧支队在富阳龙门整风刚结束，根据上级指示，由陈湘海同志带领金萧支队五大队二百五十人左右的接管建德小分队，从龙门出发，经罗茨埠、芝厦，翻乌龙岭，五月五日下午到达庵口。陈湘海带领警卫员邵渭勇（现已离休）等人先进入梅城防守司令部，同35师政治部主任兼城防司令郝培苗、219团政委蒋科同志接洽关于接管建德事宜。开始，郝司令、蒋政委怕人冒充，对陈湘海的身份、此行目的表示怀疑。陈湘海向他们出示由金萧地区工委出具的介绍信，对方才深信不疑。于是，接管小分队整队入城。

接管小分队进城后，即以金萧支队建德办事处名义住在县府东边民房内办公。

(二)

此时，伪代县长孟光发及其残部在大军进驻前是有计划逃跑的，窜逃前曾将伪政府财产物资进行了破坏性处理。所

以当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解决粮食供给。

当时，一方面我军“约法八章”的城市接管政策十分严格，不能随便向地主、土豪强行征粮，同时还要为待命向四川进发的大军补充粮草、保证供给驻军的粮食。这样，接管小分队同志连续多天只能喝两餐稀饭。因此，当时有些同志想不通，闹情绪，满腹牢骚：“进城还不如打游击，打游击时还能吃饱饭，现在反而饿肚皮了！”陈湘海同志一方面给全体同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劝告他们要克服困难、安定情绪：“困难是暂时的，要经受得起考验，度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另一方面，动员全体同志到居民区去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并积极征购粮食。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

与此同时，接管小分队为了完成大军提出的补充兵员、壮大队伍任务，陈湘海带领办事处同志深入到严州中学青年学生中去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有许多青年学生踊跃参军，给大军补充了新鲜血液。

大军对接管小分队的工作十分满意，关系很融洽。军政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五月下旬开始，大军分批撤离建德。郝培苗司令临走时，为了表示对陈湘海同志的感谢，向陈湘海赠送了两匹马，陈也把自己一块心爱的手表回赠郝司令作纪念。七月初蒋科政委临别时也曾和陈湘海互赠礼物作留念。蒋科政委赠陈一顶帐子；陈赠蒋科一支“金星”钢笔。双方告别时，互相鼓励：“待全国解放后，我们再相会！”

(三)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五月二十日左右，蒋科政委要求陈

湘海同志开始以建德县县长的身份出面。当时，陈湘海即打电话到杭州军管会请示张凡同志。张凡同志指示，要陈湘海同志以办事处主任代理县长职务开展工作。

虽然建德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但是，以伪浙江保安队突击支队头目王之辉、丁谷为首的部分国民党残匪仍然盘踞在乾潭、三都一带山上，进行垂死挣扎。他们经常下山骚扰，并且进行一系列的反动宣传，散发黑传单，胡说什么“打倒大军”，“金萧支队万岁”等。企图挑拨大军和金萧支队的关系。我军识破其阴谋，一方面积极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剿匪；一方面发动政治攻势，敦促王之辉匪部投诚。如派遣王伯达（办事处副主任）、吴长春等人上山招降王之辉。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在我军强大的军事追剿和政治攻势下，匪部迅速土崩瓦解：

我军在乾潭、长宁一带消灭了王之辉匪部二百余人；

陈同庆率王匪第四大队共五十多人向我投诚；

在乾潭的一次剿匪中，活捉了王之辉匪部的“参谋长”，进一步瓦解了敌军；

丁谷率部下四十多人向我投诚；

王之辉率三十多人在乾潭上徐桥向我投降。（但王之辉投降后，向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在部队担任要职，遭拒绝后，不久乘机又逃窜上山。直到九月份，我军在罗村一带彻底肃清了王之辉残部。但王之辉只身潜逃，现在香港。）从此，建德境内匪徒基本肃清，使民主建政工作顺利开展。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陈湘海同志调离建德，到浙江省委党校办公室工作。

现在陈湘海同志在建德横山铁合金厂安度晚年。我们在

一九八六年十一、十二月份曾两度拜访了陈老，见他精神矍铄，向我们谈了解放初期他的亲身经历，据以汇报如上。

忆往事 思亲友 盼统一

胡武林

一、父亲被蒋介石单独召见

1942年春天，我父亲胡国宾，任国民党空军第三路军司令部参谋长。那时三路军司令部的司令官是王叔铭，他是国民党空军元老，是我父亲在航校一期的教官。他一直很器重父亲的才干，经他竭力推荐，由航空委员会报请蒋介石，准备提升我父亲任三路军司令部副司令官。在命令未下达之前，蒋介石决定要亲自召见。于是父亲在王叔铭的陪同下，星夜由成都飞抵重庆（当时空军第三路军司令部驻在成都郊区红牌楼附近），准备接受召见。

到重庆后，航空委员会周至柔主任，当面交待了召见时应注意的事项，要求军容整洁，回答问题简明清楚，甚至连军装的钮扣、军衔标志是否结实，都作了仔细的检查。次日上午，父亲在王叔铭的带领下，由航空委员会驱车前往军事委员会。抵达后，先到侍卫室签到，经禀报同意，留下随身携带的武器，才在值班侍卫引导下，进入办公室。蒋介石指着我父亲问王叔铭：“他就是胡国宾吗？”王立正回答：“是的！”蒋招招手说：“坐下！坐下！”接着问父亲：“是哪

中发现千里岗上正有一支溃败潜逃的国民党残军。

“快！立即抢占龟山。”指挥员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数百名战士迅即呼啸着向龟山挺进。

龟山，土名耙山，它似倒立的铁耙那么陡峭，从山脚往上瞧，简直要掉下帽子。它怪石嶙峋，犬牙交错，荆棘丛生，常人望而怯步，故终年杳无人迹。

数百名战士火速冲到龟山脚下，立即搭起人梯，奋勇往上攀登。倾盆大雨急骤地打击着战士们的脸，使呼吸都显得比较困难。特别是几天来追击南逃敌军的急行军，使体弱的战士此时连站立也很费力了。突然间队列中一名小战士一脚踩滑，跌下山去。只见数十米深的悬崖石缝里长出来的灌木树晃了几晃，随即什么也看不见了。战士们见了眼里噙着泪水，但谁也没有哭出声来，而是一心想着快抢占山顶，阻击残敌南逃。当他们艰难地攀登上悬崖，猫腰往山顶冲击时，先我抢占了山头的敌军突然射来一排排枪弹，有的战士未及提防猝然中弹倒下，为创建新中国贡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敌军凭借着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枪弹犹如暴风骤雨，急遽疯狂地向我袭来，进行阻击。我战士们每前进一步，都将付出血的代价。看来硬拼是很难取胜的。此时，隐蔽在岩石后面的指挥员心急如焚，只见龟山山顶地形易守难攻，而我军正处于半山腰间，进退两难；特别是如若敌军乘势发起冲锋，我部队将有覆没的危险。指挥员边再仔细察看龟山地形，边酝酿下一步的打法。此时，他发现龟山山后还有座山，比龟山高出数十米，状如奶头。查阅军用地图方知此山名叫奶头山，且同龟山相毗连。指挥员兴奋地一拳击在膝盖

上，马上下达命令：“一连坚守阵地，进行佯攻，吸引敌人火力。后续部队立即向白坞进发，抢占奶头山！”

一连战士开始佯攻了。果然敌军的轻重机枪发疯似地拼命进行阻击，“嚯”、“嚯”的子弹在岩石上相撞击，立时腾起一股股硝烟。正当敌军打得起劲时，突然，奶头山上枪声沸腾，我后续部队已经攻占了奶头山。此时隐蔽在岩石后的一连战士立即发起冲锋。响亮的冲锋号声响彻了整个山谷，使敌军闻声丧胆。在我军的两面夹攻下，敌军抱头鼠窜，龟山终于被我部队胜利占领。

临时屯扎在新桥村的敌军指挥部，得知我军已攻占龟山的消息后，立即气急败坏地组织反攻。因我军占领了龟山，就卡住了敌军经李家的通道，使之不能夺路去衢州往南逃窜。因此，纠集了所有的六〇炮等，疯狂地向龟山发射，炮弹呼啸而过，龟山顿时硝烟弥漫。有的炮弹竟飞越龟山，在李家村的田畈中爆炸。接着，敌军就发疯似地一次次地反扑，拼命要夺回龟山。双方进行着一场激战。只见龟山顶红光冲天，枪炮声汇成一股强烈的声浪，经久不息。被炮弹炸碎的岩石片如同冰雹一般的散落在李家村，直到夜阑人静，枪声才渐渐稀落平息下来。

深夜，李家村民翁有林自告奋勇为我部队炊事班战士带路，送饭上山。到达龟山山顶时，只见战士们到处坐着休息，一片寂静。原来这时战斗已经结束。最后，由翁有林带路，战士们分批从小路撤下山来，进驻李家村。

当时李家村群众早已离家四处躲避，整个村子一片沉寂，连狗叫声也听不见。战士们进村后，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但见家家闭门，户户落锁。为了不惊动群众，部

队战士就在鹅卵石砌成的小街两侧的屋檐下、石阶上躺着休息。

第二天清晨，战士们正在李家村小街上三三两两地吃早饭，突然侦察员骑马赶来报告：昨夜，敌军残部已从源口逃往寿昌。于是，紧急集合号吹响了，战士们立即中止了吃饭，并整队出发，进行追击。

部队出发后，李家村的群众自发地上山，只见山上到处是尸体、弹壳。光弹壳就装了好几箩筐。群众将解放军战士的遗体安葬在麟山脚下，建成三座烈士墓，立碑纪念。因群众对国民党军队抓伕、抢猪鸡、抢东西，早已恨之入骨，故对山上到处横陈着的国民党官兵的尸体，谁也不愿去收拾埋葬。直到以后，尸体腐烂散发出恶臭，大家不堪忍受时，不得已才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用火烧了。

邵延焘回忆“五四”运动

毛 飞 明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亲身参加者邵延焘老先生，字吉晖，建德下包邵家人，生于一八九五年三月初七日。一九一六年八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求学。一九二〇年七月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立第九师范学校任教。后来九师并入九中（即严州中学），就在浙江省立第九中学任教。解放后，任严州中学副校长。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调金华农校，后调兰溪中学任教。现在退休，住梅城家中。邵延焘老先生年高体健，记忆力清晰。现根据他对“五四”运动经过始末的回忆，多次口述记录，整理成此篇。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三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的起因，是由于山东青岛和胶济铁路的权利问题而引起的。一九一四年七月底八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强占德国租借我国的山东青岛和胶济铁路。一九一五年，日本又提出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诱逼一心梦想做皇帝的袁世凯接受。这就激起我国同胞，尤其是北京青年学生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一方的失败结束。一九一九年一月，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了对德缔

里人？黄埔几期学生？”父亲马上立正回答：“浙江建德人，军校六期毕业。”蒋介石显得很高兴，连声说：“好！好！我们是同乡，又是师生。”接着他又十分关切地问了一些家常，父亲都恭敬地作了简单明瞭的回答。最后蒋介石还鼓励了一番：“空军很重要，你们都很年轻，前途无量，今后要努力效忠党国……”。继而话锋一转：“今天因为忙，没时间请你们吃饭了，晚上由你们的秘书长美龄代表我，大家聚聚餐！”

这次单独召见，前后仅十来分钟，但父亲竟出了一身汗。以后，随着地位的升迁，父亲被单独召见的机会也多了。记得1946、1947这两年，父亲在空军参谋学校任校长时，每年学员毕业，蒋介石都要亲自来训示一番。毕业典礼结束后，还和父亲合影以示抬举。

二、一张令人怀念的照片

解放前我家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抗战后期，在成都红牌楼前照的。照片上共有四人，司令官王叔铭居中，依偎着他的是他的独生爱子王自强，他的右边是父亲（当时任三路军司令部副司令官），左边是参谋长赖名汤。

王叔铭，山东人，工作认真，很严肃。平时不抽烟喝酒，是个典型的军人。他一直都很器重父亲，并举荐他任空军参谋学校校长。当时该校被誉为空军最高学府，是培养中级以上空军指挥官的基地。父亲上任后，成绩显著，深受他的赞赏。当时王已任空军副总司令，有重大事情还总是先和我父

亲商议。

赖名汤是航校二期的学生。听父亲说：“他是航校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头脑冷静，有办事能力，特别擅长处理棘手的问题，是个很重感情的军人。”抗战后期，赖名汤被周至柔看中，派他到美国考察深造，自此就再没见面。

王伯伯、赖叔叔去台湾后，都官至空军上将，并先后任国民党参谋总长。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三、镀金表和金戒指

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哥，是父亲在航校学习时的飞行教官。他很喜欢父亲勤学忠厚的品质。抗战胜利前后，他升任空军副总司令，并常驻美国，负责联系美国援助国民党空军的军用物资，选送出国人员赴美考察实习，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国述职。1947年他回国时，专门邀请父亲去叙旧，并赠送镀金表一只。

父亲生前还珍藏着一枚具有特殊意义的金戒指。它是父亲和他的七位同学深厚友谊的见证。正面是一个小方块，小方块里刻有八条波纹。小方块象征着大海，八条波纹代表着八位同学，意即大家的情谊。这八位，除了父亲，还有王百育、刘求峰、赵仲一、赵国标、胡伟克、谭以德，另一位的名字现已记不起了。

王百育是江西九江人，航校一期出类拔萃的学生，是一期学生中最早当上飞行大队长的，在抗战中以身殉国。刘求